

# 马克思的“适应性”货币 流通理论及其在现代的变化

——一个基于金融资本的观点

□ 裴 宏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本文在考证了马克思的货币及货币流通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是以商品货币理论为基础的一个“适应性”货币流通理论。在这个理论中,货币流通被动地适应着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运动。这反映了在 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产业资本及实际生产过程主导着货币资本的运动。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流通本身反映了金融资本的利益,金融资本通过货币金融市场主导着货币资本的运动。货币流通过程不再被动地适应实际生产过程的需要,而是积极地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结构和再生产。

关键词: 商品货币理论; 货币流通规律; 金融资本

中图分类号: F0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6)05—0005—08

## 一、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

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质上是商品。和一般商品一样,货币的价值是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关系由双方劳动价值的量的比例决定。同时,货币是劳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劳动价值总是并且只能通过一定量的货币得到表现。这一认知构成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核心。

这种货币理论保证了马克思从“价值(商品)”到“资本”的经济学构架是贯通的。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一方面是商品,是现实的价值实体;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的一般形式和运动起点,因此,现实中以货币为表现形式和最终目的的资本运动和增值过程,本质上也必然只是价值实体的运动和增值过程。利用这个原理,人们就能透过货币运动过程探究蕴含在劳动过程内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本人正是将这一点视作他的经济理论比古典经济理论要优越的地方——因为对于后者而言,货币问题和整个价值理论无关<sup>[1]</sup>。

但是客观上,马克思获得这样的突破,在理论上也付出了至少两点“代价”。

首先,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至少就马克思的实际论述过程而言,要求货币“必须”是商品。这一点十分典型地表现在货币的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理论中。对马克思而言,由于劳动价值必须在交换中通过一定量的货币得到表现,因此,货币本身必须是一定量的价值实体,或者更通俗地说,货币必须“有价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数理研究”(15CJL003)

值”。商品货币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分析起点。正如Germer<sup>[2]</sup>所考证的,马克思只“定义”了商品货币并贯彻于其终身研究中。

其次,货币流通过程必须契合于价值生产过程。由于上文所述的货币、资本和价值的统一性,货币流通必须以其内在价值为制约机制,严格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和需要。尽管马克思也大量阐述了纸币和银行券,但他始终是将它们视为商品货币在“流通手段”职能上的信用替代物而进行阐述的。信用货币不存在脱离商品货币的独立的内涵。所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流通机制被“锁定”在商品的实际生产过程中(包括一般商品和货币自身的生产),或者说,货币流通的变化只能通过生产过程的变化得到说明。本文把这种“锁定”机制称为“适应性”货币流通理论。

## 二、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

### (一)马克思关于不同形式货币的流通理论

虽然马克思只有一种货币理论,即商品货币理论,不过马克思对商品货币理论的具体表述主要包含了三个对象:黄金、纸币和银行券。其中,黄金是商品货币的直接代表形式。马克思重点以黄金为具体对象阐述他的商品货币理论。而对于纸币和银行券,马克思则是将它们视作黄金的替代物进行论述的。在马克思看来,抽象货币本质上只不过是商品货币身上某些职能的演化形式。<sup>[3]146</sup>因此,抽象货币的运动规律,必然同样要服从商品货币的基本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必须以特殊的商品货币(黄金)为锚。

不过,在对货币流通机制的具体分析上,马克思对不同形式货币的分析却是不同的。

对于黄金,马克思认为其流通量由两个因素决定:商品的价格总量和黄金的流通速度。黄金的流通量适应这二者的变化而变化。“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sup>[3]141</sup>

马克思认为保证这一流通规律得以实现的机制是黄金的贮藏货币职能。黄金的价值贮藏功能形成了一个“货币池”,根据商品结算的需要,适量的黄金从这个货币池流入和流出。他说:“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sup>[3]154</sup>“货币池”完全弹性地调节了流通中的黄金的量。“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sup>[3]154</sup>

对于纸币,马克思首先将纸币看作是黄金的替代物,其规律是由黄金决定的。“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sup>[3]147</sup>

以此出发,马克思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系统的特殊现象。马克思的解释是,通货膨胀本质上是过多的纸币作为流通手段进行流通。这样,单位纸币所代表或执行的黄金数量下降了,那么,同样的黄金价格体系在形式上就表现为膨胀了的纸币价格体系。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个纸币单位和黄金进行兑换的价格标准变化的问题。因此,对马克思而言,没有独立的关于纸币的供给或者流通理论。他只是从纸币对黄金货币规律的破坏的角度说明了纸币的供给特征:“……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似乎纸币不论多少都可以纳入流通。”<sup>[4]111</sup>以及这一特征的实现途径:“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sup>[3]149</sup>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纸币单纯作为交易中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它的流通,在数量的意义上是“外生的”、“完全刚性”的,其来源是社会信用和国家的强制流通。马克思没有阐述或解释它可能的内生机制。如白暴力、Moseley提出的,若纯粹从数量关系的角度说,马克思的纸币理论和货币数量论没有太大差别。<sup>[1][5]①</sup>

①当然,其内涵和理论原理完全不同。

对于银行券的流通规律,马克思回到了和黄金类似的表述方式。马克思认为,处于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是由其所要支付的货币价格所决定的。因为本质上,票据是“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sup>[6]590</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围绕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大段引述和评论中明确主张:“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sup>[6]592</sup>“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sup>[6]594</sup> 以及,“银行券的流通既不以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该行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在地库中贮藏的金数量为转移。……只有营业本身的需要才会影响流通的货币即银行券和金的数量。”<sup>[6]596</sup>

从银行券的角度而言,其流通规律与黄金一致,是“内生的”、“完全弹性”的。但与黄金不同的是,这种“完全弹性”并不是来自于银行券的“贮藏职能”。马克思将其机制解释为银行券内在的“回流规律”。与纸币类似,马克思也没有阐述关于银行券的独立的供给和流通理论。它的流通仍是以黄金流通为内涵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但在形式上是“断裂”的。从内涵上说,无论对于什么形式的货币,马克思始终认为货币是价值的外在形式,反映着特定的生产过程。任何形式的货币的流通,在马克思那里,通过最终回溯到黄金形式,都以不同的形式直接反映着生产的要求。不过,这种一致性在形式上却被不同的流通规律和机制所支配。而且马克思似乎没有尝试去协调这种“断裂”,也并不试图完整地构建黄金“货币池”、纸币的“国家信用”和银行券“回流规律”等不同机制之间的理论联结。

事实上,马克思并不试图协调这种“断裂”是有其背景的。在马克思的时代以及他的理论中,纸币和银行券都由贮藏的黄金来支撑,二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黄金的符号。那么,它们的运行规律在形式上就不需要是一致的,只需要说明这种运动规律及不一致性是如何分别从黄金的运动规律中“一致地”派生出来,就能保证货币理论的完整性。可以说,马克思抽象货币理论中的这种“断裂”恰是当时资本主义货币关系的产物。

## (二)马克思的“适应性”货币思想

无论马克思给不同形态的货币赋予了多么不同的,或“弹性”或“刚性”的流通特征,它们背后都蕴含着一个统一的“适应性”货币流通的思想。

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说,“货币池”、“国家强制流通”和“货币回流”这三种表面上完全不同的机制,在实质上反映货币市场上“适应性”货币供给的特征:货币市场上的供给主体只能被动地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供给主体的利益和能动性对货币流通量没有真实影响。

“货币池”理论中不存在独立的货币供给主体。如威克斯所指出的,“货币池”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来自于商品流通环节的沉淀,资本周转过程中必要的准备金和其他黄金贮藏过程。<sup>[7]</sup>“货币池”理论中的货币供给在“质”上是处于贮藏状态的黄金;在“量”上由产业资本自身的运动规律决定,随着产业资本自身的运动而运动。货币池理论中的货币供给是适应性的。

在对纸币的分析中,马克思只是简单地谈及了国家强制纸币流通作为纸币供给的最终来源,同时认为“纸币不论多少都能进入流通”。显然,货币市场的供给方对投放的纸币也是纯粹“适应性”的,只不过和“货币池”理论相比,这种适应性是对外部“刚性”参数的适应。也就是说,用今天的话讲,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可以由央行完全控制。货币市场主体对货币供应乘数没有任何影响。

在马克思的银行券理论中,银行是货币供给的主体。但是,由于银行券本身只是商品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上的一种信用形式,银行只能根据真实市场,也就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量投放银行券。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银行券的量本身也是由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所决定的。所以,银行券的流通量只能也



必须服从产业资本的实际结算需要,并且只有需要以银行券代替黄金行使职能的时候才能出现。

总之,在马克思对黄金、纸币和银行券的分析中,其供给都是适应性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的需求理论也是“适应性”的。从作为货币的货币而言,这种适应性表现为:货币的流通决定于实际中的商品价格总量,而商品价格的量最终决定于商品的劳动价值量。又由于劳动价值量由商品的实际生产过程决定,因此货币流通的需求也只是在“适应”实际生产过程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将货币流通看做生产资本的运动过程时,即作为资本的货币而言,这种适应性则表现为货币流通“被动地”适应实际生产过程的需要,后者进一步表现为产业资本运动过程中资本形态的转化过程。例如,马克思说道:“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sup>[6]473</sup>

无论从供给还是需求的角度而言,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都认为,实际生产过程是货币流通的决定者,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决定着货币的流通规律。货币流通必须以适应生产过程的需要为前提。同时利息只是单纯表现为货币供求关系的产物。马克思并未正面论述利息的变化如何反作用于货币供求双方。马克思也并没有正面阐述货币市场的变动,通过利息率,如何反作用于产业资本运动,影响实际生产过程。正如卢卡雷利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利息只起到间接的作用。<sup>[8]①</sup>

### 三、金融资本对货币流通的影响

马克思的“适应性”货币思想本质上是由19世纪资本主义的时代特点决定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产业资本是资本的典型形式,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其他资本形态,例如商业资本、虚拟资本都处于从属地位,依附于产业资本的存在和周期变化。因而货币的运动,进而金融资本的运动,主要决定于产业资本的运动。马克思对金融资本——当时还只表现为经营货币的资本——的理解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他将货币经营业首先理解为由产业资本运动过程分离出来的“纯粹技术性的收付货币业务”<sup>[6]353</sup>,并且说道:“货币经营业作为媒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但它既不决定各种互相支付的联系,也不决定它们的规模。……只在于使这些结果的平衡在技术上更完善。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而流通,买卖的范围和次数就完全不以货币经营业为转移。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卖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须的货币现金量。”<sup>[6]359</sup>可见,马克思对金融资本的理解和对商业资本的理解的出发点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从分工,即资本家职能分化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产业资本处于资本结构的中心地位,决定着货币整体的运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设定了一个潜在的理论前提:货币经营业所运营的货币——以借贷资本的形式所表现,来自于产业资本运动过程中暂时闲置的部分<sup>[9]</sup>。金融资本家仅仅作为一个“技术性中介”将这部分闲置货币借贷给其他产业资本家,后者在价值增殖之后以利息的形式返还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前者。因此马克思认为,利息率必须要小于平均利润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中,金融资本家只是“影子”资本家,金融资本没有独立的含义,也不影响平均利润率,利息表现为产业资本周转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收益形式,而非独立的金融利润。总之,货币流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只能适应实际生产过程而得到确定。

在上述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框架下,马克思的“适应性”货币流通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虽然金融资本在起点上是作为特定的职能而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这是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初始形式,但是它并不是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如黄金及其流通规律是货币在资本主义的初始形式,但它并不是货币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样<sup>[10]</sup>。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代,虽然产业资本仍然是资本主义物质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但金融资本已经脱离原有的从属地位,逐渐成为了占据支

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马克思理论中的货币概念是非常“积极的”。货币是资本运动起点和终点,既是资本主义的目的<sup>[8]</sup>,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动力机制。本文强调的“被动的适应性”是从货币流通及其同生产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的。

配性地位的资本类型。金融资本通过对货币的运作,主动地、积极地影响着产业资本的周转和循环。卢卡雷利说道:“资本主义进入了以垄断竞争和金融资本统治经济为特征的阶段。这个过程见证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不断增加的相互联系,产业资本积累逐渐被金融命令所统治。”<sup>[8]</sup>

虽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产业资本积累是“货币池”的一种实现途径,是货币供给的源泉,但如今,金融资本通过统治这个积累过程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货币池”机制的修改。或者说,金融资本的运动本身就成为了“货币池”。而且,这个“货币池”通过金融资本不断收缩和膨胀的资产负债表表现出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事实上,无论是在企业财务理论还是实践中,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的融资和负债依赖已经是其生存及资本积累的前提。不是金融资本资产负债表被动地适应于产业资本的运动而运动,而是相反,产业资本的顺利运动必须依赖于金融资本的资产负债表的稳定,而且金融资本及它统治的货币流通的任何调整都会积极而显著地影响整个产业资本的运动。用大卫·哈维<sup>[11]</sup>的语言来说,在今天,这些金融资本是可以以自主的、独立的方式运动的“特殊性”。也可以藉此回答哈维提出的问题:这些特殊性正是以上文所述的方式反过来以决定的而非偶然的方式影响生产的一般性。<sup>①</sup>

金融资本对社会总生产的支配地位是“资本支配生产”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社会关系的纯粹的、升华的形式。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特征下,“资本支配生产”这一关系在生产部门内部表现为占有资本的资本家支配生产过程。而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支配生产”不仅在生产部门内部表现为产业资本家对单个生产过程的支配,更表现为拥有更广阔资本资源的金融资本家对社会总生产过程的支配。这一支配过程的现实依据有两点:一是产业资本家是单个生产过程的投资方,经理人原则上为产业资本家的利益负责。而金融资本家成为跨行业的投资方,其覆盖的所有产业原则上为其资本利益负责。在产业技术构成越来越高的今天,绝大多数公司仅靠前期内在利润的积累投资已经不现实,金融资本是产业投资的必然前提。二是,根据当代公司财务理论,适当的负债是公司金融配置的最优形态。因此,金融资本不仅仅起到传统意义上的中介及投资作用,甚至成为公司维持现金流和日常资产组合的常规前提。脱离了金融资本,不仅公司无法投资,甚至连日常的周转都无法维持。因此,金融资本可以认为是社会总生产的资本所有者,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处于支配的顶端。

在这一条件下,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是通过对货币流通过程的积极干预实现的。金融资本通过支配货币在货币市场上的流通获得利润,正如产业资本通过支配其商品资本的运动获取利润一样。金融资本以自己的资本利益为出发点,作为货币供给方积极地在货币市场进行操作。利息作为金融资本利润的源泉,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金融资本对货币的供给,进而决定着产业资本的运动。金融资本也遵循其他资本类型的一般规律和形态:追逐利润动机下的短视和投机、垄断、风险评估错误、激励缺陷和信息失灵等等都会在金融资本上得到表现。这些资本特征都会通过影响金融资本的行为对货币流通过程产生影响。

金融资本本质上是为自身的利益进行运动的,但由于其产品——信贷和货币的流通从根本上影响着整个经济运行的背景和框架,因此在金融资本身上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特殊形态。传统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一方面,每个资本都由私人利益出发并在行为上进行私人决定,但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每个资本的行为都必然影响着其它所有市场的均衡。这一点在金融资本对货币流通的控制上得到进一步的表现,金融资本的私人利益不仅通过一般市场均衡影响其它市场,更是从整个货币流通的层面上直接决定着所有市场的运动和平衡。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上的高级表现。

<sup>①</sup>大卫·哈维(2016)的问题是:“利息率和生息资本的流通可以以自主的、独立的方式运动,因为它们是由不断变化的供给、需求以及竞争所决定的特殊性。借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能使这些特殊性反过来以决定的而非偶然的方式来影响生产的一般性?”<sup>[11]178</sup>

金融资本对货币流通过程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对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示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货币对价值的表现,是以货币自身的劳动价值为基础,从而用自己的使用价值的量来表现商品的价值。但随着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变化,现代货币体系中没有商品货币基础,因此现代研究中主要采用MELT(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这一概念来重新表述劳动价值的货币形式。如后文将证明的,在MELT的意义下,货币的流通过程和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示互为因果。金融资本可以通过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反作用于MELT。作用机理是,金融资本通过对产业资本的影响来影响一般商品的价格体系和产业结构,从而影响货币数量体系和价值体系之间的对应关系。

总之,由于金融资本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货币流通过程不再如19世纪那样依附于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被动地适应生产条件(包括商品生产条件和货币自身的生产条件)的变化。相反,它以寻求金融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积极主动地干预实际生产过程。

#### 四、金融资本影响下的货币流通数理分析

考虑一个以金融信用为基础进行融资的非联合生产体系。设 $p$ 为生产价格向量, $b$ 、 $A$ 和 $L$ 分别为实际工资率,投入系数矩阵和直接劳动投入向量。企业 $j$ 向金融资本以利息率 $i$ 借贷了货币量 $z_j$ , $z$ 为由 $z_j$ 构成的单位产出上的贷款向量, $\pi^r$ 为产业资本实现的平均利润率。有:

$$p - (1 + i)z = (1 + \pi^r)[p(A + bL) - z] \quad (1)$$

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利息和产业利润是总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因此必有:

$$Lx - mpbLx = m\{izx + \pi^r[p(A + bL)x - zx]\} \quad (2)$$

其中 $x$ 为产出向量, $m$ 为单位货币所折算的劳动时间(MELT)。上式左边表示剩余价值总量,右边分别为(折算为劳动时间之后的)利息和产业利润总量。联立(1)与(2)可得:

$$m = \frac{Lx}{p(I - A)x} \quad (3)$$

可见,金融资本及其金融收益过程不会对MELT的表达形式产生影响。<sup>①</sup>现在,将(1)式两边同乘以 $x$ ,并将其中的 $zx$ 记为 $D$ ,将 $p(A + bL)x - D$ 记为 $C^r$ ,可以整理为:

$$px = (1 + \pi^r)C^r + (1 + i)D \quad (4)$$

其中 $D$ 代表贷款额度, $C^r$ 代表产业资本的自有资本。

由于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和资本体系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收益率上存在相关性。出于简化而不失一般性的目的,本文假设在均衡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均获得一个全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即有金融利润率 $\pi^f$ =产业利润率 $\pi^r$ =总资本平均利润率 $\pi^*$ 。由于金融资本的收益即是贷款利息,设金融资本为 $C^f$ ,因此有:

$$iD = \pi^f C^f \quad (5)$$

将上式代入(4)式并考虑到 $\pi^f = \pi^r$ ,可以得到:

$$G = px = (C^f + iD)\left(\frac{C^r + C^f}{C^f}\right) + D - C^f \quad (6)$$

该式表达了在均衡处,社会总货币流通量由下述因素共同决定:金融资本量 $C^f$ ,货币市场利息率 $i$ ,信用融资额度 $D$ 以及资本结构 $\frac{C^r + C^f}{C^f}$ 。顺带一提,容易证明,当取 $D = C^f$ 时,上式退化为标准模型的传统形式。

<sup>①</sup>如SSI(单一体系)或NI(新解释)(参见Dong-min Rieu, 2014<sup>[12]</sup>; 孟捷, 2015<sup>[13]</sup>)所证明的,在不存在信贷过程的非联合生产体系下,MELT的表达形式与(3)式相同。



另一方面,根据托宾和戈卢布<sup>[14]</sup>,在现代金融的视角下,货币流通量问题实质上转化为金融资本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资产负债表上对“收益性债权”和“防御性现金头寸”的持有决策问题。这个决策又是基于产业资本在金融资本资产负债表上的存款量、金融资本本身的量、货币市场利息结构、央行货币政策等条件的。因此,参考托宾和戈卢布<sup>[14]</sup>,贷款量D可以用下述函数来表示:

$$D = D(i, C^r, C^f) \quad (7)$$

因此, (6) 式可以进一步表达为

$$G = px = [C^f + iD(i, C^r, C^f)] \left( \frac{C^r + C^f}{C^f} \right) + D(i, C^r, C^f) - C^f \quad (8)$$

这意味着,在现代金融体系下,货币流通量最终是以货币利息率*i*为媒介,由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量和结构共同决定的。这一过程中,金融资本的行为通过贷款渠道起到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正如哈维所指出,在当代,金融资本拥有独立的特殊运动形式,这一特殊运动形式自身决定了利息率*i*。它们成为了产业资本运动的起点,并直接和间接地决定了生产过程及其利润率——尽管从逻辑和历史上看,金融资本只是产业资本的派生形式。<sup>①</sup>

最后考虑MELT的问题。回到(3)式,可见虽然金融资本及其贷款行为不会对MELT的表达形式产生影响,但由于它根本性地影响了*p*和*x*的量,所以它间接地影响了MELT的量,或者说,影响了劳动时间和货币之间的对换关系。这一事实,从货币流通的角度来说,支撑了孟捷<sup>[13]</sup>关于在信用货币体系下,MELT本质上受投资和信用融资过程影响的观点。

在以金融资本为典型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流通形态的变化,来源于金融资本对货币流通机制的改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流通是以产业资本的实际周转和流通为主导的,货币市场不存在实质上的影响。但是,在金融资本体系下的货币流通过程是金融资本的逐利过程本身。货币市场积极地影响着产业资本的周转和循环,这种影响决定并反映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过程。

## 五、结 论

马克思的适应性货币流通理论反映了19世纪资本主义货币流通的典型特征:由于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尚未脱离产业资本的循环,货币运动只能被动地反映着产业资本的运动和价值实体的生产过程,尚未获得独立的运动形态和运动规律。当产业资本扩张(收缩)时,货币的流通量就适应性地上升(下降)。同时,纸币、银行券等信用货币都还只是黄金在某些职能上的替代物,它们的运动服从着商品货币的运行规律。所以,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存在货币运动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物价或者商品总价格的整体上升只能是实际生产率,进而劳动价值变化的结果。

不过,19世纪已经出现了局部的和短期的货币运动意义上的通货膨胀。马克思察觉了这一点,并把它理解成货币形态的发展所蕴含的潜在矛盾。也就是说,虽然并未正式论述并纳入他的劳动价值论框架,但马克思对“货币运动和流通并非自动适应产业资本的周转和积累”这一命题的观点是开放的。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三十章谈论危机时所散述的,物价的上涨和下跌会伴随着信用扩张、产业周期、纯粹的投机而存在。不过,马克思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他仍然主要把货币流通、产业资本积累以及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今天,货币流通不再只能“被动地适应”实际生产过程的需要,而是寻求积极主动地干预实际生产过程。这是因为货币流通反映着与产业资本相独立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和行为。原来从属并服务于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如今获得了支配货币资本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不仅仅表现为金融资本整体对

<sup>①</sup>对于利率*i*的决定机制可以展开额外的讨论。基于对货币市场的不同认识——大金融资本主导的或者完全竞争市场的,可以产生不同的利率理论以丰富这一等式。但这些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改变这一等式所反映的经济关系。

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供给的垄断,往往还表现为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垄断。这一垄断造成了金融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支配和主导地位。金融资本能够通过控制货币流通积极地影响着产业资本进而实际生产过程。并且,金融命令通过货币流通过程,影响着实际生产过程的价格体系、产出向量、资本积累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当然也包括货币的MELT本身。

最后,从马克思笔下的适应性货币流通到当代以金融资本为出发点的货币流通,反映了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的“异化”过程。在起源上,它作为产业资本的派生物,职能上服务于生产过程。但一个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则反过来主导着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

#### 参考文献:

- [1] FRED MOSELEY. Introduction, in Fred Moseley.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2] CLAUS GERMER. The Commodity Nature of Money in Marx's Theory, in Fred Moseley.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5] 白暴力, 吴红梅. 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与价格总水平模型——兼与货币数量论比较[J]. 当代经济研究, 2003, (5): 3-6.
-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7] 约翰·威克斯. 商品货币理论及其经验可信性[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2, (1): 185-207.
- [8] 比尔·卢卡雷利. 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和危机的理论[J]. 国外理论动态, 2011, (2): 32-40.
- [9] 石晶莹. 再论马克思利息理论与凯恩斯利息理论的不同点[J]. 当代经济研究, 2007, (2): 13-16.
- [10] MARTHA CAMPBELL. Marx's Explanation of Money's Functions: Overturning the Quantity Theory, in Fred Moseley.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11] 大卫·哈维.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12] DONG-MIN RIEU, KEONBEOM LEE and HYEON-HYO AH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onetary Expression of Concrete Labour Time under the Inconvertible Credit Money System[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4, (2), 190-198.
- [13] MENG JIE. Two Kinds of MELT and their Determinations: Critical Notes on Moseley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15, (2), 309-316.
- [14] 詹姆斯·托宾, 斯蒂芬·戈卢布. 货币、信贷与资本[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收稿日期: 2016—03—08 责任编辑: 赵爱清)

### Marxist theory of the “accommodation”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and its changes at modern times--A viewpoint on financial capital

Pei 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Based on Marxist theory of currency and currency circulation,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currency circulation theory is an “accommodative” on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oods currency. In this theory, currency circulation adapts to the cycle and turnover of industrial capital passively. Bu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currency circulation itself reflects the interests of financial capital which dominates the movement of money capital through currency financial market. The process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does not meet the demand of real production process passively any more, but influences the whole capitalist s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actively.

**Key words:** Commodity monetary theory; Law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Financial capital